



# 来自文明

LAIZI WENMING

# 十字路口的民族

SHIZILUKOU DE MINZU

陈海涛 刘惠琴 著

## ——唐代人华粟特人研究



粟特民族是源于中亚的一个古老“商业民族”，在唐代以昭武九姓的名称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几百年间，粟特人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物质的交流，也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作出了贡献。由于史料、语言等诸多多种因素的限制，国内对粟特民族的研究还很不够。本书作者在研读大量史料及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粟特民族的汉化过程进行了剖析，进而揭示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及规律。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

——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

陈海涛 刘惠琴 著

商 德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陈  
海涛,刘惠琴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675-0

I. 来… II. ①陈…②刘… III. 古代民族—民族  
历史—研究—西北地区—唐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076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ÁIZI WÉN MÍNG SHÍZILÙKǒU DE MÍN ZÚ

**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

——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

陈海涛 刘惠琴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75-0/K·878

---

2006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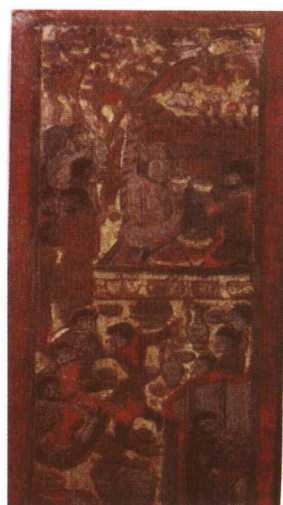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 元**



北周安迦墓出土石榻  
后屏乐舞图一



北周安迦墓出土石榻  
后屏乐舞图二



北周安迦墓出土石榻后  
屏乐舞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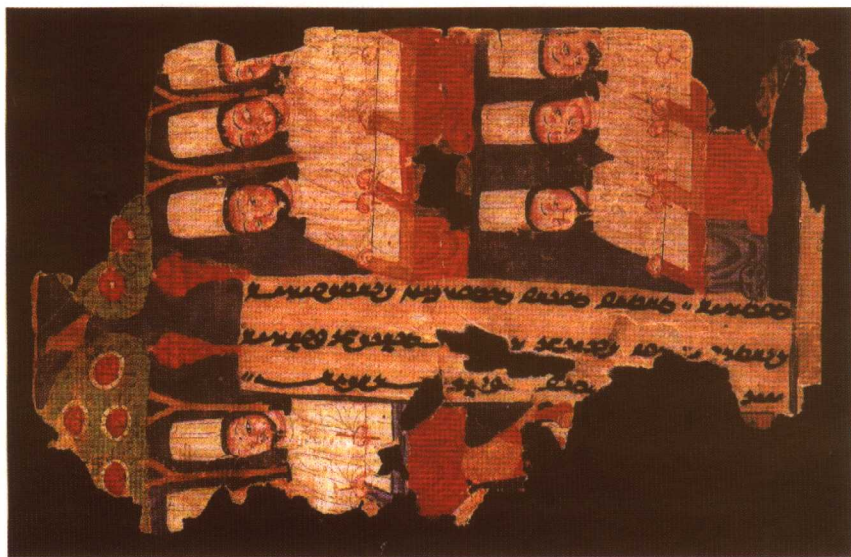
敦煌壁画商旅图(上图为商队到达驿站,下图为胡汉商队在途中相遇)



康国故地发现的唐代风格壁画(唐装仕女泛舟图)



康国故地发现的唐代风格壁画(诸使献礼图)



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插图



新疆柏孜克里克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文献

# 序 言

粟特民族被认为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在中亚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他们不但创造出独特灿烂的粟特文明，还借助居于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独特地理优势，在沟通商业贸易的同时，不但将自己的独特文化传播至四方，并且也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文化艺术的传播者。更为重要的是，始自汉魏的粟特民族同中原社会的交往，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也同时达到高潮。随之而来的大量粟特文化传入中原，在与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原文化的碰撞中，激起了更加灿烂绚丽的火花。

##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汉民族本身就是历史上众多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说，“凡历史种族皆为杂种。汉种为历史种族，则吾人研究中国历史，又得下一公例：汉种为杂种。”<sup>①</sup>在汉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就有中亚粟特民族的成分。今天，但凡姓氏为康、安、米、史等诸姓之人，都极有可能为粟特人之后裔，但今天无可争议都已成为汉民族之一员。粟特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虽不

---

<sup>①</sup> 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原载《东方杂志》27卷17期，收入作者《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3页。



独开始于唐代,但这一过程的高潮,则出现在唐代,并且就是在唐代最终得以完结。因此,通过考察唐代入华粟特人不同阶段的汉化特点及其具体汉化进程,有助于理解汉民族构成中的基本规律。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一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依次为印度文化,以波斯、粟特为代表的中亚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但就唐代而言,来自粟特的异域文化无疑成为外来文化的主流,是对唐代社会产生“胡化”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大量异域文化的入华,极大地促进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繁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①</sup>通过对唐代入华粟特人所带来的粟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个案的探讨,可以更加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异域文化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文化生活领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也最为积极,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由于自身文化的繁荣,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更为成熟。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异域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排斥,异域文化的某些成分逐渐成为汉文化之一部分;而另外一些成分,则在短暂的流行之后旋即消失。文化的交流是一个内容复

---

<sup>①</sup>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杂的过程,但“每一种文化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各有特色的,是各个民族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继承一定的历史传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当体现不同文化的代表人物相互接触的时候,彼此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互相借鉴,按照自身的需求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因此,各种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必然产生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既有选择、吸收、融合,也有拒绝、排斥、扬弃”。<sup>①</sup>通过对唐代汉文化对粟特这一异域文化“汉化”改造过程的探讨,可以了解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决定取舍的具体因素,这无疑是特定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同时,通过对唐代粟特文化“汉化”进程的考察,必将会给我们对今天不同文化之间交流问题的探索提供一定的经验,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认识。

由此可见,对唐代入华粟特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历史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 二、本课题研究状况的回顾

关于粟特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关于粟特人入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则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据初步检索,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专著、论文已达一二百篇(部),概括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领域:

### 1. 关于粟特本土历史的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首先是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G. Hamby《中

---

<sup>①</sup> 张广达:《试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收入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1 页。

#### 4 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

亚》(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9)、巴尔托里克《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Wilhelm Eilers《剑桥伊朗史》(“Iran and Chin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Cambridge, 1983)、M. A. Dandamaev《阿契门尼德王朝政治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 J. Vogelsang, E. J. Brill, Leiden, the Netherlands, 1989)、W. J. Vogelsang《阿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东伊朗地区》(*The Ris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the Eastern Iranian Evidence*, E. J. Brill, Leiden, the Netherlands, 1992)等,国内成果则有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龚方震和晏可佳《袄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陈海涛《阿姆河宝藏及其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等。这些著作虽然并不都是专门论述粟特地区,但相对集中地对粟特地区的整体历史及其与波斯、希腊、突厥及阿拉伯等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介绍,有助于对粟特历史的总体了解。

其次是对隋唐时期粟特地区历史的专论,主要成果有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均收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1987年第2辑)、《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中亚学刊》1990年第3辑)等,具体论述了隋唐时期粟特地区的历史状况。

另一方面比较集中的是关于粟特民族的族源问题。黄文弼

《大月氏故地及西迁》(《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熊义民《粟特昭武王室考》(《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等都认为,粟特民族同中文史籍所记载之大月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综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陈海涛《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等却认为,粟特民族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立民族,与大月氏无关。

## 2.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

在这一领域对粟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斯坦因敦煌所发现粟特文古信札的研究。因其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粟特文文书,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在对其年代的断定上,形成两种观点:亨宁《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Vol. VII, 1948; Included in W. B. Henning *Selected Papers* II (Acta Iranica 15), Leiden, 1977)认为属于312—313年。这一观点得到格瑞内、辛姆斯—威廉姆斯《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王先平译,《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森安孝夫《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5年第7辑)、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

年第1期)、荣新江《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1995年第3卷)等的赞同。而哈尔玛达在其《斯坦因和粟特文古信札》(“Sir Aural Stein and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Jubilee Volume of the Oriental Collection 1951 - 1976*, Budapest, 1978)、《粟特文古信札的考古学证据》(“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Studies in the Source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8)中则提出属于200—204年,这一观点也得到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概述》(《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等文章的支持。

再次是对敦煌、吐鲁番所见粟特人社会活动的研究。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认为张议潮起义至少运用了三支力量,其中之一就是粟特人,并且此后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人的生活状况和汉化问题。在商业活动上,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丝绸之路也是“白银之路”,在7世纪以前,吐鲁番和敦煌地区都是白银通货的流通区,商业民族粟特人是银钱流通的推行者,而在唐代,则变为沿着“丝马贸易”之道流出铜钱的状况,这依然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荒川正晴《唐帝国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陈海涛译,《敦煌研究》2002年

第3期)都通过对几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具体分析,论述了粟特人在唐代社会的商业活动情况。

此外,较为集中的还有对敦煌粟特人宗教信仰及聚落的研究,将在下文有关部分中分别述及。

### 3. 民族关系史领域

在这一领域的最主要成果,体现在对粟特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其中就粟特人与突厥的关系,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支那学》,1923年第3卷第5号)、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1955)、《内蒙古的粟特人聚落》(“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 41, 1952)、缪勒《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正》(龚方震译,《中外关系史译丛》1986年第3期)、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山川出版社,东京,1967年版)、张广达《唐代六胡州地区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芮传明《突厥第一王国时期突厥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和《粟特人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记功碑考》(《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程越《粟特人在中原与突厥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N. 森姆斯威廉《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王菲译,《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等,不但强调了粟特人在突厥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粟特人也多利用突厥人势力而参与同中原的交往。

在粟特人与回鹘的关系上,集中体现在回鹘信仰摩尼教的问题

题上。学术界普遍认为粟特人不但帮助回鹘人发展商业活动,同时也对回鹘王国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回鹘信奉摩尼教,就与粟特人有密切的关系。具体研究状况,请参见下文中关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部分。

在粟特人与吐蕃的关系上,杨铭《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认为在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对当地粟特人并非完全是压制,也存在一定合作关系。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都兰吐蕃墓中出土含授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则指出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同样影响到吐蕃地区。

#### 4. 粟特人人华聚落研究

粟特人人华后,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聚落,在唐代这一现象更为明显,也成为粟特问题研究的焦点之一。蔡鸿生《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与东方聚落》(收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将这些聚落在文化类型上分为移植型、归化型和突厥型三类。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明确提出罗布泊地区就曾经存在过粟特人的民族聚落。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在论述河朔地区的粟特人聚居时,从种族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提出由于大量粟特人的聚居,使当地呈现出严重的胡化倾向,并成为安史武装力量的主体。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

期)认为在古代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等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也都曾经存在过粟特人聚落;在其《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1999年第6卷)一文中,进一步就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粟特人聚落进行了全面翔实的论述,从而认为粟特人聚落的出现与其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将敦煌和吐鲁番的粟特人分为“著籍”与“不著籍”两类,以其身份的差异说明他们社会地位与社会活动方式之不同。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辛德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版)通过对敦煌文书中一件差科簿的分析,对吐蕃占领之前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之位置、人员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但其所提出这一粟特人聚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因粟特人的逃亡而消失的观点,则受到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和《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均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辑)等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打散唐之乡里制度,但粟特人并没有逃亡,而是促进了他们同敦煌汉族社会的融合,在归义军时期恢复乡里制度时从化乡的消失,是他们汉化完成的标志。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度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认为从化乡是在长安天宝年间由从西突厥而来的粟特人所组成,在其消失原因问题上,则赞同池田温之观点。吴玉贵《武威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1997年第3卷)对唐代粟特人安修仁、安兴贵家族之家世渊源和其在唐代的演变过程做了详尽的考察。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蒲立本《内蒙



古的粟特人聚落》、钮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论著对唐代六胡州地区的粟特人聚落的来源、演变及其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桑原鹭藏《论隋唐时代流寓中国的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1926年版;收入《桑原鹭藏全集》第二卷,东京,1987年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第1期)、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落及其汉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等文则对唐代长安的粟特人分布及其汉化现象也进行了一定论述。

### 5. 宗教学领域

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对此,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对此都有一定论述。特别是祆教信仰,更是粟特民族最主要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近年来,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高永久《西域祆教考述》(《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和《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姜伯勤《论高昌胡天和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